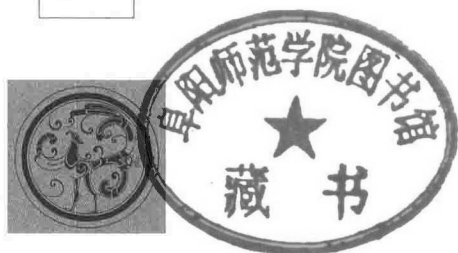


唐代四言诗研究

张
炜 / 著



唐代四言诗研究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选择了鲜有学者涉足的唐代四言诗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唐代四言诗产生的时代背景、作者情况、思想内容、风格特色、审美特征及在诗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填补了四言诗研究领域的空白。

本书通过对唐代四言诗的格律化问题、四言诗和音乐的关系、四言诗和唐代五七言诗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系统的考察研究,发现唐代四言诗之所以走向衰微,而又不断有作品出现,是和唐代诗歌的格律化、音乐的传承发展及其他因素密切相关的,清晰地展现了四言诗在唐代的发展轨迹。

本书适合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研究者、高校中文及相关专业教师和学生、古典文学爱好者等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四言诗研究 / 张炜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3-048978-4

I. ①唐… II. ①张… III. ①四言诗—诗歌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0822 号

责任编辑: 郭勇斌 曾小利 蔡 芹 / 责任校对: 郭瑞芝

责任印制: 张 伟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3

字数: 250 000

定价: 6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的出版得到下列项目的资助

2014 年度广西高校科研项目“中国古代四言诗史”(YB2014393)

第二批广西高等学校高水平创新团队及卓越学者计划“传统·地方·国际交融的岭南与东盟文学交流互动研究”(桂教人[2014]49号)

前 言

唐代诗歌（以下简称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名家名作犹如灿烂的繁星耀眼夺目，相关研究浩如烟海。然而，在夜空中总有一些作为陪衬的星辰，也许很难被发现，却也有着自己微弱的光芒，如唐代的四言诗。

唐代四言诗整体上是衰微的，但是仍然有一些作品存在，甚至一些大诗人也有四言诗传世。研究唐代四言诗衰微的原因及这些作品继续存在的理由，可以对唐代社会乃至唐诗发展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加深对唐诗的理解。通过系统的考察研究可以发现，唐代四言诗之所以继续魏晋之后的颓势，却不断有人创作，能够在唐代继续生存下去，并且偶尔还能出现一些广受赞誉的作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四言诗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格律化的倾向，在唐代继续有所发展，并且有了一定数量的作品，拥有一个创作群体。但是由于创作群体的特殊性和题材的狭窄，以及自身的种种局限，这种新的体式最终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像五言、七言律诗那样成为诗坛的主流。

第二，魏晋以后四言诗向宫廷化、贵族化的方向发展，题材范围越来越小，作者也越来越少，这些都和音乐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隋唐以来，原有的雅乐及雅乐歌辞在战乱中被保存下来，其中的四言郊庙歌辞等也得以保留，并在唐代修订雅乐后继续得以发展。同时，上古至汉魏的古琴曲有不少在唐代得以保存，经过唐代音乐家和诗人的共同努力，加以改造后继续创作流传，其中的歌辞就有四言诗，如韩愈的《琴操》十首就是其代表作，得到后人的很高评价。此外，还有一些以“歌”“诗”命名的四言诗其实也是可以入乐的歌辞，只是以往并不为人注意罢了。

第三，唐代四言诗之所以作家、作品稀少，主要是因为唐代士人的诗学观念及四言诗本身的局限性。而那些能够受到后人赞誉的作品往往都是与“唐音”交相辉映的，具有情真意挚的精神风貌、“兴寄深微”的艺术追求和庄严雅正的

艺术风格。

综上所述，唐代四言诗的稀少是由于四言诗本身在社会环境和生存土壤改变以后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格律化四言诗的昙花一现就是很好的说明；同时，唐代四言诗又能偶尔被文人所用来创作出一些好的作品，则是因为经过有创造力的诗人的改造，得以继续发挥自身作用，反映社会生活的缘故。如此，四言诗在唐诗星空中划过的轨迹也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目 录

前言	
引言	1
第一章 唐代四言诗的演变发展	3
第一节 初唐四言诗的因革	3
第二节 盛唐四言诗的新探索	23
第三节 元和时期四言诗对时代的歌唱	54
第四节 晚唐皮、陆四言诗的复古情结	87
参考文献	92
第二章 唐代四言诗合律情况初探	97
第一节 唐代四言诗合律的形制特点	97
第二节 唐代四言诗格律化的渊源	105
第三节 格律化对四言诗的影响	118
第四节 唐代四言诗格律化的原因	120
第五节 唐代复古思潮下四言诗对格律化的反拨	130
参考文献	134
第三章 唐代合律四言诗与五言、七言律诗之比较	137
第一节 艺术形式的异同	137
第二节 时代背景的相似性	148
第三节 艺术生命力的巨大反差及其原因	151
参考文献	160
第四章 唐代四言诗与音乐的关系	161
第一节 唐代四言郊庙歌辞的旧制与新声	162
第二节 唐代琴曲与四言琴曲歌辞——韩愈《琴操》十首的音乐性	168
第三节 唐代四言乐歌举略	172



参考文献	177
第五章 唐代四言诗的总体特征	179
第一节 作者稀少，题材分布不均衡	179
第二节 讲音律、重兴寄的艺术追求	189
第三节 庄严雅正的总体风格	193
参考文献	198
后记	200

引 言

四言诗，即以四言句式为主组成的诗歌体式。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四言诗歌的创作贯穿始终。先秦时期，《诗经》的结集见证了四言体诗歌的辉煌，到汉魏六朝，四言诗继续发展，产生了韦孟、曹操、曹丕、王粲、阮籍、嵇康、陶渊明等四言诗大家。与此同时，四言句式也在其他文学样式如赋、颂、铭、赞等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有唐一代，四言诗歌的创作仍然在延续，据《全唐诗》所录，四言诗达到700余首，李白、韩愈、柳宗元等大诗人也偶有涉猎。实际上，隋唐以后乃至宋、元、明、清，四言诗已不像五言诗和七言诗那样成为诗坛的主流，古今学者也普遍认为四言诗在《诗经》之后便每况愈下，到了唐代已是难以为继。明代谢榛的《四溟诗话》（卷一）说：“四言古诗，当法《三百篇》，不可作秦汉以下之语”^[1]，唐元稹的《杜诗补注》（卷二）甚至认为杜甫所反对的“伪体”就是“当时学四言诗及楚词者言也”^[2]，但这却恰恰反映了唐人学习创作四言诗的热情，道出了“唐人集中掇风骚等作甚众”^[2]的实际情况。历代都有不少诗人热衷于四言诗的创作，其中的原因引人深思。四言诗为什么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并且具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引无数文人墨客研习和传诵？这一文学现象的背后究竟有怎样一股强大的推动力？四言诗和其他诗歌体式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

从四言诗的研究现状来看，存在着两个明显的问题。首先是作品被无视。唐宋四言诗作为唐宋诗歌的一部分，在诗歌史上应该有一席之地。然而，学术界多年来似乎对此视而不见，无论是专著还是单篇论文都极少有人论及唐宋及此后历代的四言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毕竟我们不能无视这具备一定数量，且参与的优秀作家又如此众多的创作成果。目前，只有韩国人崔宇锡的《魏晋四言诗研究》一书为唐前四言诗研究专著。其次是传统观念的制约和研究重点的不平衡。由于《诗经》的崇高地位和辉煌的艺术成就，自古以来学者就把它看作四言诗的最高峰和学习标准，钟嵘《诗品序》就说：“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3]，宋人刘克庄《后村集》（卷十七）诗话上也说：“诗四言尤难，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4]由于《诗经》在儒家经典的地位，《诗经》研究几乎成为四言诗研究的主流，并成为显学，历代研究著作浩如烟海。研究者主要从注释、名物、赏析、语言声韵、训诂、辨体、选诗、文化学、西方阐释学、文学接受、女性文学、综合研究、《诗经》研究史等角度进行《诗经》的研

究。《诗经》以后的四言诗作者，在汉魏六朝诗人中也仅推崇曹氏父子、王粲、陆机、陶渊明等寥寥几人，“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陆士衡后惟陶公最高。”^[4]虽然对四言诗的没落起于何时说法不一，但四言诗在后代衰落，而没有像五言诗、七言诗那样成为“百代不易之体”^[5]，是古人的共识。总之，偏重《诗经》研究，忽视四言诗研究；偏重唐前四言诗研究，忽视唐宋及后四言诗的存在，是目前学界的大致倾向。对于唐宋四言诗，古代早有评论者。宋黄仲元《昭武危西仲寄傲轩记》论苏轼和陶渊明四言诗说：“坡老和翁四言五言，风味大略相似。及和翁辞，自许为翁后身，毕竟道着翁意落在何处。……”^[6]另外，清人赵翼的《陔馀丛考》辟专章论四言诗，对唐宋李白、柳宗元、苏轼等的四言诗有所提及。而当下，对唐宋四言诗的研究，尤其是系统性的研究可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笔者希望通过努力再现唐代四言诗的本来面目，对影响唐代四言诗发展的一些因素做出科学系统的论证，并为唐代以后的四言诗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 考 文 献

- [1] 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150.
- [2] 郭绍虞. 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9.
- [3] [梁] 钟嵘. 诗品.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2.
- [4] [宋] 刘克庄. 后村诗话(前集)卷1. 王秀梅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 3.
- [5] [明] 胡应麟. 诗薮·内编. 卷6.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101.
- [6] 李修生. 全元文. 卷261.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365-366.

第一章 唐代四言诗的演变发展

第一节 初唐四言诗的因革

唐初为了满足巩固基业的需要，诗歌的主旋律是颂圣应制、润色鸿业，由于四言诗在颂美题材上具有的传统，在这段时期其创作十分活跃，主要集中在四言郊庙歌辞的创作上，另外有一些零星的公宴诗、赠答诗等，内容也基本都是以颂扬为主。在这一片颂扬声中，四言诗也在时代文学风尚及政治风云的影响下孕育着革新，到武则天时期出现了成熟的四言格律诗。

一、南北朝四言诗创作概说

古老的四言诗在经历了《诗经》时代的辉煌和魏晋时期的再次勃兴之后，逐渐衰落下来。作品题材的渐趋狭窄、艺术性的下降、作者群体的缩小都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四言诗的衰落究竟始于何时，自古以来众说不一，但对于四言诗在南北朝时期的衰败则并无异议。有学者认为魏晋时期是“四言诗的终结时代”^[1]，也有学者说四言诗在南北朝“最终退出诗坛”^[2]。

诚然，四言诗在魏晋以后彻底让出了主流地位，而五言诗等其他诗体开始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但四言诗却并未退出诗坛，也远没有到消亡的地步，而是持续不断地有人进行创作，在一些题材中坚守着自己的领地，有些诗篇甚至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四言诗不仅没有被谢灵运、颜延之、沈约这样的大诗人所抛弃，而且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乃至政治生涯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一）南北朝四言诗创作概况

通观南北朝四言诗，题材主要集中于赠答、公宴，以及乐府中的郊庙歌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等。四言咏物诗数量虽不多，但相比魏晋来说，却呈现出一种延续的状态。此外，军戎诗、政治讽刺诗等间或也有零星数篇。相比前代四言诗，南北朝四言诗的题材确实少得多，咏怀、游仙、哀伤等题材在南北朝均已销声匿迹。

从题材分布来看,南北朝四言诗创作主要发生在文人出席祭祀、朝廷宴会、官员聚会等庄严肃穆的正式场合和庄重的社交场合,礼仪性是其内在的精神实质。例如,颜延之、王俭、谢朓、沈约、萧纲等的公宴诗;谢灵运、王融、沈约、到洽等的赠答诗,以及谢灵运、颜延之、王俭等的郊庙歌辞、相和歌辞等。而抒发文士一己之情怀的题材(或流连哀思,或徜徉山水、羡慕神仙,或咏叹身世坎坷、偃蹇不遇,等等)则退出了四言诗的领地,尽数归于以五言诗为主的其他诗体。可见,到了南北朝时期,文人辨体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四言诗和五言诗等诗体在题材上的分化,四言诗的领地虽然进一步缩小,却也更加集中,剥离了那些带有个人情怀和感官感受色彩的题材内容,明确了为统治集团讴歌唱颂,为国家政治、家族传统服务的创作目的。例如,谢灵运的赠答诗创作在出守永嘉之前皆为四言,诗中应酬的成分比重较大,此后谢灵运开始流连于山水之间,他为私交甚密的谢惠连所作的赠答诗就已经改用五言来写作。

从作者的身份来看,南北朝四言诗的作者多数为世胄贵族或达官显宦,并且是地位显赫一时的人物,接近帝王、太子,处于皇室权力中心的范围之内,有时甚至就是帝王或太子本人。如前所举谢灵运、颜延之、谢朓、萧纲、沈约等,或者是贵族出身,或者是显宦之后,或者是先皇族后帝王,而出身寒门又官卑职小的鲍照等则极少创作四言诗。

(二) 南北朝四言诗得以继续创作的缘由

诸多学者已在论著中详尽地指出四言诗在魏晋之后难以为继的原因,有的从四言诗本身体式的局限来说明,有的从音乐的角度来阐述,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事实上四言诗在南北朝仍有生存的空间,且在诗歌创作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这是为何?下面按照南北朝四言诗的类别分别加以探讨。

1. 谢灵运的赠答诗一枝独秀

赠答诗最早应追溯到《诗经·大雅》中的《崧高》《烝民》两篇,两篇是吉甫分别赠给申伯和仲山甫的。《崧高》最后一章说:“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烝民》最后则说:“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两首诗的内容主要是颂扬对方祖上功德,赞美对方的德行,社会交际的礼仪意味远远大于私人来往传情达意的意义,这种传统也被后代所广泛继承和模拟。汉代以来的赠答诗便以四言为正体,到了南北朝也不例外。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言,建安

时期“五言腾踊”，五言赠答诗的数量也超过了四言，但四言正体的地位未曾改变。晋挚虞《文章流别论》曰：“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3]而两晋赠答诗四言诗的数量又超过了五言诗，据统计，两晋四言赠答诗有97首，五言则有88首^[4]。在汉代至东晋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四言赠答诗的面目也发生了不小的改变，不仅是模拟《诗经》而已，除了诗前加小序和分章之外，还加入了玄言的内容，修辞上注重对偶、描摹自然景物、比拟人物等，并且加大了抒情的比重，一改过去诗经体严肃刻板有余、情志不足的面貌。郭璞、孙绰、王胡之、谢安等是此时期四言赠答诗的代表作家。

刘宋时期，一则国祚不长，只延续了五十几年，二则战乱频繁，作品大量湮没，赠答诗总体数量不多，四言赠答诗更加稀少。除王韶之、丘渊之各有1首之外，只有谢灵运作品较多，所存9首赠答诗中有5首都是四言诗，不能不作为重点考察对象。

谢灵运的赠答诗创作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在永初三年（422年）38岁时被权臣调离京师，出守永嘉之前，谢灵运的赠答诗皆为四言，且全都是写给谢瞻、谢弘元、谢弘微等同族兄弟的；在此之后，谢灵运开始流连山水，以前的政治抱负也在遨游放任中慢慢地消磨殆尽。他在自己的人生后期与族弟惠连过从甚密，感情非同一般，他对惠连的赠答诗已经改用五言来写作。同为同族兄弟，而亲疏不同；同为赠答之作，而诗人的心态前后相差甚远，诗体的选择便自然有所不同了。比如，谢灵运赠给从兄谢瞻的四言诗《赠安成诗》有序：“从兄宣远，义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成，其年夏赠以此诗。到其年冬有答。”^[5]谢瞻应答的《于安城答灵运诗》几乎隔了半年时间，且又是五言诗。不仅如此，谢灵运答诗也用四言，应答谢瞻的《答中书诗》、应答谢弘微的《答谢谘议诗》都是如此，足见谢灵运对四言诗的偏爱。

导致这种偏爱的有多重因素。首先，由东晋入宋，谢灵运的诗作直接传习了东晋诗风，而东晋正是四言赠答诗流行的时期，谢灵运的四言赠答诗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东晋四言赠答诗的印记。试举谢安四言赠答诗《与王胡之诗》^①六章：

鲜冰玉凝，遇阳则消。素雪珠丽，洁不崇朝。
膏以朗煎，兰由芳凋。哲人悟之，和任不操。
外不寄傲，内润琼瑶。如彼潜鸿，拂羽雪霄。
内润伊何，壘壘仁通。拂羽伊何，高栖梧桐。

① 除另行注明出处者，文中出现的唐前诗歌均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颀颀应木，婉转虵龙。我虽异迹，及尔齐踪。
思乐神崖，悟言机峰。

绣云绮构，丹霞增辉。濛汜仰映，扶桑散蕤。
吾贤领隼，迈俗凤飞。含章秀起，坦步远遗。

余与仁友，不涂不笱。默匪严穴，语无滞事。
栢不辞社，周不駭吏。纷动器翳，领之在识。
会感者圆，妙得者意。我鉴其同，物睹其异。

往化转落，运萃勾芒。仁风虚降，与时抑扬。
兰栖湛露，竹带素霜。蕊点朱的，薰流清芳。
触地僂霄，遇流濠梁。投纶同咏，褰褐俱翔。

朝乐朗日，嘯歌丘林。夕翫望舒，入室鸣琴。
五弦清澈，南风披襟。醇醪淬虑，微言洗心。
幽畅者谁，在我赏音。^[6]

再看谢灵运的《赠从弟弘元诗》六章：

嵒彼明泉，馥矣芳蕙。扬睟神皋，激清灵溪。
灼灼吾秀，徽美是谐。誉必德昭，志由业栖。

憩凤于林，养龙在泉。舍潜就跃，假云翔天。
饪以味变，台以明宣。言辞戚朝，聿来鼎藩。

昔尔同事，谓予偕征。睽合无朕，聚散有情。
我端北署，子腾南溟。申非授乖，饮泪凄声。

缅邈荆巫，杳翳江湍。三千既旷，繇役实难。
想象微景，延伫音翰。因云往情，感风来叹。

寝处燕说，指辰忌薄。伉离未几，节至采获。
静念霜繁，长怀景落。人道分虑，前期靡托。

视听易狎，冲用难本。违真一差，顺性谁卷。
颜子悔伤，蘧生化善。心愧虽厚，行迷未远。

平生结诚，久要罔转。警掉候风，侧望双反。^[6]

二诗同为分章体，都是六章，且章法结构也大体一致，都是前几章颂美对方仁德，用冰雪、甘泉、芳草自然物象比拟对方高洁的人品，又用龙凤比喻对方杰

出的才能；中间几章回忆畅想双方的友情，描写在一起共处的情景；最后一章则涉及玄理，以玄言结束全篇。二者都是将颂美、抒情和玄言融为一体，有所不同的是，谢灵运诗抒情的成分更大，抒情也更为真实可感，如第三章：“昔尔同事，谓予偕征。睽合无朕，聚散有情。我端北署，子腾南溟。申非授乖，饮泪凄声。”情感真挚，语言不像谢安诗那么隐晦曲折，用典也比其要少得多。此外，用“缅邈荆巫，杳翳江湍”“想象微景，延伫音翰”一类诗句描摹山水景物以帮助抒情，也是谢灵运对前辈同类题材作品的新突破。

其次，宗族意识的影响。谢灵运作为谢氏名门望族之后，对自己的家世是深感自豪的，在15岁时就曾作《谢封康乐侯表》，其中有言赞美祖父谢玄道：“亡祖奉国威灵，董符戎重，尽心所事，克黜祸乱，功参盘鼎，胙土南服。”^[7]不仅拥有辉煌的家族历史，谢氏家族还一直非常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据《南史·谢弘微传》记载：“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晦、曜、弘微以文义赏会，常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诗所言‘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姓’者也。”^[8]可以想象，青少年时期的谢灵运与同族兄弟们结伴读书游赏，结下了深情厚谊，过着何等充实而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这段生活在谢灵运心里留下了长久的美好记忆，多年后在写给同族兄弟们的赠答诗中多次提到了这些美好的片段，表达兄弟之情。赠给谢瞻的《答中书诗》中写道：“伊昔昆弟，敦好闾里。我暨我友，均尚同趾。仰仪前修，绸缪儒史。亦有暇日，啸歌宴喜。”赠给从弟弘元的《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诗》又说：“契阔群从，缱绻游娱。历时阅岁，寒暑屡徂。接席密处，同轸修衢。孰云异对，翔集无殊。”这些诗句真情流露，有真实的生活体验，并非一般的客套周旋，和许多纯粹为交际应酬而生搬硬套的赠答诗有本质区别。

由于赠答对象都是同族兄弟，加上继承了魏晋以来将四言赠答诗作为书信的传统，谢灵运的这些四言赠答诗更接近于连接宗族兄弟之间亲情纽带的私家书信性质。从前文所举《赠从弟弘元诗》五六两章可以看到，诗人对自己的处境和未来感到深深的忧虑，以古人与对方共勉，吐露出自己的心声，这种袒露心迹的话非关系私密的人不能言，可见此诗的功能实际上已经等同于私家书信。之所以选择四言体，是因为四言诗同时还具有颂美的功用和庄重的礼节性质。毕竟对方与自己年辈相当，且身份尊显，用四言体更为大方得体。这一点从谢灵运与谢惠连的五言赠答诗便可以清晰地看出端倪。谢灵运所作予谢惠连的赠答诗为三首，分别是《酬从弟惠连》《登临海峤与从弟惠连》^[9]①《答谢惠连诗》。其中，《酬从弟惠连》五章如下：

① 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167页“宋本《三谢诗》诗题作《登临海峤与从弟惠连》”，此从宋本。



寝瘵谢人徒，灭迹入云峰。岩壑寓耳目，欢爱隔音容。
永绝赏心望，长怀莫与同。末路值令弟，开颜披心胸。
心胸既云披，意得咸在斯。凌涧寻我室，散帙问所知。
夕虑晓月流，朝忌曛日驰。悟对无厌歇，聚散成分离。
分离别西川，回景归东山。别时悲已甚，别后情更延。
倾想迟嘉音，果枉济江篇。辛勤风波事，款曲洲渚言。
洲渚既淹时，风波子行迟。务协华京想，讵存空谷期。
犹复惠来章，只足揽余思。倘若果归言，共陶暮春时。
暮春虽未交，仲春善游遨。山桃发红萼，野蕨渐紫苞。
呜嚶已悦豫，幽居犹郁陶。梦寐仁归舟，释我吝与劳。^[10]

谢灵运对谢惠连的欣赏史书中有所记载，《宋书·谢灵运传》载：“灵运尝自始宁至会稽造方明，过视惠连，大相知赏。”^[11]但观此诗，谢灵运对小自己20余岁的从弟谢惠连绝不仅是“知赏”而已。“岩壑寓耳目，欢爱隔音容”“别时悲已甚，别后情更延”“悟对无厌歇，聚散成分离”，这些情深意笃的诗句就算是放在男女情诗中也十分自然，丝毫不显得突兀。“夕虑晓月流，朝忌曛日驰”，二人的交往已经达到心灵的契合，既是从兄弟、诗友，又是无比亲密的挚友，自古以来忘年之交深挚如此者，恐怕无出其右。而“末路值令弟，开颜披心胸”揭示了谢灵运如此表现的原因：感到政治抱负无望，处于人生末路的谢灵运，已经将与谢惠连的情谊当作了一大人生寄托。正因如此，谢灵运对谢惠连的感情与其他同族兄弟是不可能一样的，于是和谢惠连之间的赠答便选择了更加长于抒发婉转委曲之情的五言诗。比较谢灵运四言与五言赠答诗，大致有以下几种差异：第一，四言以书面语为主，且间或化用《诗经》中的诗句，如《赠从弟弘元诗》首句“愍彼明泉”即源于《邶风·泉水》中的“愍彼泉水，亦流于淇”。用典也比较常见，如《赠从弟弘元诗》中的“颜子悔伤，蓬生化善”及《答谢谘议诗》中的“齐仲善交，在久弥敬”“于穆谢生，以和缮性”，都是连续用典的例子。与谢惠连赠答的五言诗语言则通俗直白、平直晓畅。第二，四言感情抒发较为冷静平和，真挚而不失庄重典雅，五言则热烈奔放，大开大合，无所顾忌，有一吐为快之感。同时四言抒情还不能脱离颂美、玄言等成分，沿袭两晋以来四言正体的观念和东晋以来的书写传统。

最后，和谢灵运本人的才情、性格、人品等个人因素有关。

第一，谢灵运有着很强的文章辨体意识，并对此有清晰的论述。他在《山居赋》中说自己：“伊昔韶皃，实爱斯文。援纸握笔，会性通神。诗以言志，赋以

敷陈。箴、铭、诔、颂，咸各有伦。”西晋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主张诗的功用在于抒情，谢灵运则仍然继承传统的“诗言志”思想。从谢灵运的自述中可见其从小便受到儒家经典的严格教育，四言诗是他在童蒙时期就已熟悉的功课，而他也是个深受传统诗书教育濡染的好学生，这从谢瞻应答谢灵运的诗句“华宗诞吾秀，之子绍前胤”（《于安城答灵运诗》）中就可以依稀推想得到。在谢灵运等文士眼里，四言诗是庙堂文学，是干政和联络宗族的工具，有严格的场合限制。谢灵运的四言诗很少写山水，山水诗都集中为五言诗，这也是有意的分工。其四言赠答诗都作于永初三年八月出守永嘉之前，时年38岁。而以五言诗和谢惠连赠答已经到人生的后期，为元嘉七年，是年已46岁。出守永嘉以前，谢灵运在政治上还是有可为的，至少一直处在权力斗争的中心地带，与同族兄弟间赠答尚多互相勉励之词，四言体正好符合了此时“言志”的要求。比如，《答谢谘议诗》中互相勉励的言辞：“感昔戎行，远暨西垠。黽勉于役，不敢告勤。尔亦同事，契阔江沔。庶同支离，攘臂解纷。”言辞恳切，鼓励对方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在出守永嘉后，谢灵运的政治热情被寄情山水所替代，五言山水诗陡然增多，《登池上楼》等名篇即作于此时。直到元嘉五年，谢灵运离京回乡，与谢惠连等人“游娱宴集，以夜续昼”^[12]，被弹劾免官，早已没有了青壮年时期的锐气，只是流连山水，完全沉浸在遨游之中，“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登江中孤屿》）。五言诗对于细腻地描摹山水景物，抒发细腻幽微的思念之情显然更加适合。

同时，出于“诗以言志”的诗体观念，谢灵运在四言赠答诗中时常流露出内心深处的真实思想，加之此类诗体近似于家书的性质，因此表达情志往往更加直白不讳。义熙八年，谢灵运早年追随过的刘毅在和刘裕的政治角逐中失败被杀，谢灵运的族叔谢混作为同党也被赐死在狱中，这对谢灵运的打击甚为沉重，《答中书诗》一诗可与史书互证，其中有一段文字带着感慨和失落回忆了这段历史：

嗟兹飘转，随流如萍。台岳崇观，僚士惟明。
 璿璣下陪，从公于征。溯江践汉，自徐徂荆。
 契阔北京，劬劳西郢。守官末局，年月已永。
 孰是疲劣，逢此多青。厚颜既积，在志莫省。^[13]

“中书”，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认为是谢瞻，因为诗中有回忆乌衣之游的句子，而同族兄弟中只有谢瞻曾任中书侍郎，此说固然正确，但关于此诗的创作年代，顾绍柏认为是义熙八年刘毅败亡之前，则欠妥^[14]。从题目看，谢灵运作此诗时赠答对象任“中书”，而根据《宋书·谢瞻传》，谢瞻担任中书侍郎、宋中书这几个与“中书”有关的职位是在担任安成相之后^[15]，据《赠安成》诗